

陆贵山文集

第六卷

作家出版社

现代西方社会，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社会文化思潮的对抗和冲突。就而言之，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本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它渗透并支配着现代西方社会的理论和文学的全方位和全过程，成为现代西方社会的理论和文学的核心理和灵魂。人们为将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本主义同文艺复兴以降乃至启蒙运动、狂飙运动^{时期}的那种光明的古典的人本主义相区别，往往把前者称为个人本主义。这种新的人本主义的思想内涵和精神意向和光明的古典的人本主义是迥然有别的。光明的古典的人本主义作为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武器，其批判锋芒指向腐朽的封建专权，追求

陆贵山文集

第六卷

文艺理论卷

陆贵山 著

作家出版社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强 文艺理论研究(代序)

科学发展观是一种关于科学发展的理念和方法。为了坚信和重视这种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我们党已经把科学发展观提升到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理论创新,对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七大提出并系统论证的科学发展观,是从改革开放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和提炼出来的,充分体现出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精神,是科学发展观在改革开放时期所取得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靠科学发展观。发展是硬道理。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要与时俱进,又要协调发展,防止严重失衡;要发展,又要以人为本;要发展,又要建设和谐社会;要发展,又要科学发展;要发展,又要稳定;要发展,又要可持续;要发展,又必须进行宏观调控和综合治理;要发展,又要追求又好又快;要发展,又要解决民生问题;要发展,又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努力建设自然友好型的能源节约型国家,如此等等。所有这些重要方面的论述都闪耀着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光辉。革命和建设成功都是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胜利,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样是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新胜利。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开放都是靠体现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发展观取得了赫赫实绩。文艺理论研究同样只有依靠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所体现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取得新的成

果和新的进展。

一、文艺理论发展的迂回曲折之路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呈现出“之”字形的演变和发展轨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更高的水平上加以肯定、扬弃、整合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从传统的“结构”到“解构”再到“重构”的过程；从“单一”到“多元”再到“有主导的多元”的一体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传统经典承受各种考验，包括各种文艺观念的冲击和挑战、质疑、消解、颠覆和反对，特别是在现当代西方文论的理论资源融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之后，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思想内涵和学科形态获得了补充、丰富和发展，从而走向更加开放、更加宏阔、更加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新天地，表现出文艺理论发展的新趋势：开始从某一层面的研究走向宏观、辩证的综合创新研究；开始从单学科研究走向跨学科研究；开始从文艺理论研究走向几乎是全方位的理论研究；从解构到重构研究；思维方式开始从异向的分析思维走向和谐的综合思维。当然，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中，还是没有完成的，但从整个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中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才有利于解决一些复杂的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

二、科学方法与文艺理论研究

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尽管形态有别，但都是科学，都要用科学的理念、方法和态度来研究这些对象中所包含的真理，都要探讨这些科学所蕴涵的内部联系和特殊规律。追求、发现、阐释研究对象的规律和真理，是学术工作者的天职。科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必须或应当是科学的。只有运用科学的理念和方法，才能真正进行本体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我多年来一直苦苦思索

这样一个问题：面对大量频发和复杂多变的各式各样的文艺理论、文艺观念、批评模式和文艺思潮，怎样寻求和运用一种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综合的创新研究？这个科学的理念和方法究竟是什么呢？尽管繁花似锦的现当代西方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千殊万类，烂花迷眼，都拥有局部的和暂时的真理性，然而，从整体和全局上说，尚未发现有什么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可以和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这个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知识分子的治学道路背离了这个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能或难免会走上弯路或陷入迷途。至今为止，最先进、最科学的理念和方法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追求学科领域中的真理，探寻研究对象的规律与内在联系，才能推进学科发展、获得理论创新，攀上智慧的巅峰。

笔者在重读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时候，特别对恩格斯的几句至理名言十分赞赏。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新时代的新的科技成就，既可以理解为是唯物辩证法的新胜利，同时又又可以理解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的丰富和新的重塑。“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②；反过来可以说，辩证法本质上是彻底唯物的。脱离唯物论的辩证法和脱离辩证法的唯物论都是伪科学的。只有唯物的辩证法和辩证的唯物论以及两者的完美融合才能为学术活动提供通向真理的坦途。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必须叩问对象的底蕴。作为研究对象的现实生活本身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只有运用既唯物又辩证的理念和方法，才能切进事物的本真状态。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③；随意消解和颠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实际上是徒劳无效的非科学行为，无益于学术事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第228页，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3卷，第364页，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第284页，人民出版社，1995。

发展，甚而会遮蔽真理，或制造新的迷途和误区，有损或有害于科学的进步。“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①。恩格斯的这些既唯物又辩证的深刻思想，对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是富于启发性的。文艺理论一定会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历史的变革相应地“改变自己的形式”，表现出新的质态和新的面貌；文艺世界内部结构中的各种因素本来是辩证地联系和发展着的，文艺理论应当同样是对文艺世界内部结构的辩证存在和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一些学者往往有意识无意识地用被夸大的文艺世界的内部结构中的一种因素，排拒和贬抑另一种因素，酿成无休止的“家庭纠纷”。由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一点论、走极端、片面性、一种倾向掩盖和取代另一种倾向，使文艺界和学术界不断受到辩证法的这样那样的残酷的惩罚。经验教训应该使我们变得聪明起来。文艺理论家们应当运用辩证法这个“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对文艺理论的框架体系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研究。

4

辩证方法和辩证思维具有两大特点：反映事物的运动过程和发展趋势；反映对象的相互联系和间性关系。唯物辩证法具有两个最基本的观点：一是发展的观点；一个是联系的观点。作为研究对象的客观的外部世界既是运动的，又是联系的。在运动中联系，在联系中运动。从联系的观点看，事物都是互联性关系的总和。狄德罗首先体认到，“美是关系”，马克思把现实的历史的人的本质概括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一切事物或对象都是具有相关性和互联性的这样那样的关系的总和。因此研究带有总和性的关系，或从与带有总和性关系的联系中，研究相关的对象，才能得出科学的和与事物的本真状态相近似、相切合的结论。反映出事物在总体性关联中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必然得出与时代变迁、社会转型和历史变革相适应的结论。因此，我们主张一切有志于做“人类灵魂工程师”，具有科学态度的文艺理论工作者首先应当确立先进的科学态度，自觉地运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新时代的科学发展和能充分体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4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95。

这种科学发展观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观察文学艺术。

三、 科学辩证法与文艺理论研究

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反映着对象之间的内部联系。只有唯物的辩证方法和辩证思维，才能有利于解决文艺理论领域中的一些复杂多变的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

这些问题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一） 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较强调文艺的客体性问题。新时期以来，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文艺的主体性问题。文艺是在经济政治领域内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语境中“向内转”的。经济和政治的“向外转”和文艺的“向内转”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错位。本来，精神现象的转向应当和经济政治现象的转向是相适应和同方向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诚然，有的学者对主体性的强调是为了调动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提供思想动力，产生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的学者把对主体性问题推崇到完全排斥客体性的程度，高扬文艺的“自我表现”说，宣称“文艺即是心灵的表现”，从而又使主体性问题走向了极端。看来，忽视主体性不适度地强调客体性和脱离客体性极端地夸大主体性都是不科学的，还是应当坚持和发展主客体关系的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是这样论述文艺的主客体关系的：“对象对他（指主体——引者）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指对象——引者）相适应的（人的——引者）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指对象和主体的互相关

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即作品——引者)。”^①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主体对象化和对象主体化以及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相适应”和作品的特殊性质和面貌取决于主客体关系的“规定性”这样一种带有母元意义的“交互相用”的“规定性”原则,这个思想对解决文艺的主客体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意义。

(二) 反映论和价值论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比较强调文艺的反映论,并认为反映论是价值论的基础。新时期的一些文论特别注重价值论。这是正确的。但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取代关系和置换关系。有的学者用价值论取代反映论。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撇开反映论强调价值论可能导致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迷误。脱离价值论的反映论是空的,而脱离反映论的价值论是盲目的。因此必须坚持和发展反映论和价值论的辩证法,“去价值论的反映论”和“去反映论的价值论”都是有违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精神的。

(三) 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问题

文艺的个性和风格无疑是重要的。个性和风格是一个艺术家走向成熟的标志。富于个性的创造性劳动是产生作品的价值和功能的前提。然而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作家不可能不表达大众和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因此,“用群体性取代个体性”和“用个体性取代群体性”都是不妥当的。

(四) 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

像僵化的教条主义所主张的那样,本质先于和高于一切现象,现象只是本质的外化、演绎和感性显现,实际上认为“本质即现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第125页,人民出版社,1979。

现象学对打破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本质论是有价值的，但现象学抱着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态度笼统地对一切本质理论，包括正确的本质理论都企图通过所谓“现象还原”，否定理论概括和逻辑抽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把现象包含着本质，简化和上升为“现象即本质”。认为“现象即本质”和“本质即现象”的观点同样都是不符合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的。

（五） 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关系问题

文艺好比地球一样，通过自转实现公转，自转一旦脱离公转的轨道，必然会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因此，理应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假使地球不自转，非但无法实现公转，而且使地球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世上没有白天黑夜、春夏秋冬，没有光线色彩，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命；倘若地球脱离公转的轨道独立自转，它必将成为一个随意飘荡的自由落体，人随着地球一样作为星空中的尘埃永远消失在无垠的宇宙中。新时期以来，一些理论家们比较强调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这对引起人们重视文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是有益的。但也有的学者通过对文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的不适度的夸大，冷漠、冲淡和疏离了文艺对社会、人民和现实生活的联系。有趣的是，正当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大力建构和宣扬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时，西方的学术潮流通过文化研究的转向，投入历史，又重新返回到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语言转向”深入到文艺“内部规律”，极而反之，“文化转向”和随之而来的“历史转向”又重返文艺的“外部规律”。这个转向和那个转向，把青年学者转得“晕头转向”。实质上，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都是完整的、有机结合的，既唯物又辩证的存在于文艺中。应当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彻底坚持和发展两者存在和发展的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可以克服两者的往返回流、不断易位的钟摆现象，防止两者的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偏废现象。

（六） 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主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和评价文学艺术，但同时也重视美学观点，认为只有把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完整地把握文学艺术的本质、价值和功能。新时期以来，特别强调美学观点，对恢复和弘扬文艺的审美特性，对文艺回归本体，作为对文艺领域中的庸俗社会学的反叛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也有个别学者又从对文艺的审美属性的强调走向“唯审美”和“纯审美”，脱离史学观点孤立地宣扬美学观点。实际上，主张“脱离美学观点的史学观点”和“排斥史学观点和美学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总之，一些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只有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和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思维方式，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理解和阐释。

四、 科学唯物史观与文艺理论研究

只有坚持和发展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客观地明智地回答一些相关的文艺理论问题。当代的学术界的一部分学者不愿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评价历史，形成了一些与历史唯物主义不相符合的缺乏科学态度的见解。如有意识无意识地通过夸大现代化进程中历史转折和社会变革中的负面因素，非但不赞颂和不肯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而美化和诗化宗法制封建社会，甚至把它说成是比一切社会形态都好的和谐社会。事实上，从全局而论，中国古代社会的和谐状态是短暂的，从总体上说，这个入治的专制的社会制度，实际上罕有什么黄金时代。长期的专制主义政治，霸道不仁、腐败不堪，连年的天灾人祸，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些带有血腥味的残酷事实，却被近年来火暴的历史剧的美化和诗化所冲淡和掩盖了，通过无根据和被随意夸大的胡编乱造，从根本上歪曲和

颠倒了那令人感到残酷和凶恶的史实。应当说，有些历史剧本质上和事实上都是非历史和反历史的，都是违背和玷污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的。据《卜辞》记载，战争频仍，生灵涂炭，尸骨成山。春秋时期发生的各种战争 448 次。战国时期发生的大规模的战争 222 次。秦始皇造“阿房宫”和“秦皇陵”动用 130 万人，其中受宫刑者多达 70 余万！秦末战争消灭了原来人口的 70%。汉武帝讨伐匈奴，造成 50% 的人死亡。西汉末年混战，人口损失 65%。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时期活下来的人只有 1%。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中国 2 亿人死于非命。可见，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充满着战乱恐怖和血腥厮杀，实际上并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么和谐可爱。诚然，历史上大约每隔千年，或许会出现一个短暂的所谓“太平盛世”，比如西汉初期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还有清代的康乾盛世。但即便是乾隆盛世，文字狱竟然多达 130 余起，动辄斩首凌迟，甚至诛门灭族，使有思想的文化人的命运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依靠政治文化高压封杀思想的清王朝，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腐朽成分得以恶性发展。善良的人们往往从唐诗、宋词中欣赏封建宗法制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幽雅、闲适、安逸、和谐、亲善的一面，然而看不到它的贫困、落后、封闭、狭隘、愚昧和专横的一面。其实，即便是在杜甫的诗中也有“三吏”、“三别”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句。马克思曾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但是我们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①

一些学者之所以眷恋过去那个幻想中的美好社会，一是秉持关于生态的理论，一是秉持关于异化的理论。前者主要是谴责现代化历史进程造成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后者主要是抨击和诅咒资本主义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 2 版），第 1 卷，第 765 页，人民出版社，1995。

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人的异化。

关于生态问题。提出保护生态，对健康地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是具有警示和借鉴意义的。工业化和机器化的生产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的破坏突出表现在发展国家的起步阶段或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无限度地征服自然是会受到惩罚的。“杀鸡取卵”式的开采和“竭泽而渔”般的掠夺，不仅威胁地球的安全，同样也会危及人类的生命。我们应当像关爱自己的生命那样，维护自然的生态，守护人类这个唯一的绿色家园。我们党和人民已经吸取了以牺牲自然生态为代价谋求发展的历史教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自然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的国家的构想和发展模式并逐步努力付诸实施。不能人为地把社会发展和生态破坏绝然对立起来。我们看到，自然生态保存完好的那些发展中的民族、地域和国家，多半都十分贫困和落后，而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实力的强大增加了对生态治理的投入，使自然环境更加净化和美化。如美国、日本，特别是北欧一些福利社会国家的自然生态更加宜人，以至使我们的一些画家亲自观赏了这些国家的自然环境清纯净美、生气盎然的自然生态，不禁发出了不是“风景如画”而是“画如风景”的赞叹。

关于现代化历史进程所导致的人的异化问题。西方的一些学者们，从卢梭、席勒、海德格尔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推崇和运用异化理论解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病变，对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影响。特别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对阐释当时社会境况下的生产和分配的残酷的劳资关系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深刻性。当今的社会和生活中，异化问题仍然以改变了的形式继续存在着。然而，异化形态下的劳资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着富有时代感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具有很大的再生能力和调解能力。高科技和信息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日趋摆脱了不自由的生产状态；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减轻了劳动者的体力负担；物质财富的剧增，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业余时间的增多所带来的自由感和轻松感，缓解了人们对劳动的厌烦情绪；人性化和民主化的管理改变着原始积累时期那种非人化的冷漠、

隔膜和痛苦；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套比较完善的强大的福利系统，给人们提供了生存的可靠性和安全感。当时的文明人抨击他们所亲眼看到的近乎野蛮的生产方式是正义的，但现在同样要注意到那种非人性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着从野蛮向文明不断演变的历史性进步过程。从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的恶劣的人际关系和生产境况所概括出来的古典的传统的异化理论，究竟还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是一个值得正视和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至于尚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当代中国，异化现象在一些领域确实不同程度的存在着，甚至个别地区还时有虐待童工和超经济剥削的情况发生。但是问题的主导方面是亿万人民大众还领受和分享不到现当代工业文明的惠顾。尽管可恨和可悲的小煤窑爆炸的不幸事件屡屡发生，农民出身的矿工还是为能拥有一份较之于农民收入和待遇更为优厚的职业更感到满意和欣喜，甚至不惜把生命的危险置之度外。失业和长期最低限度的贫困生活，才是滋生异化的人生状态的经济根源。当代中国的异化问题的主要方面表现为权力的异化和与权力相关所产生的异化。这种权力异化的发酵、辐射、弥漫、污染和腐蚀作用如不以强有力法制手段加以抑制，将会酿成十分可怕的后果。

对来自西方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我们应当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科学的鉴别和分析，作出科学的评价。从总体上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现当代西方文论话语得到了极其广泛深入的传播，成为最有影响的强势话语，对改造和重建当代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但是不仅存在着选择的盲目性，而且同时无视这些思想本身学理上的片面性。例如，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笼统地反对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是很值得研究的。他们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性，忽视这种社会形态较之于封建宗法制社会的历史进步性。他们本来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受益者，但却好像感受不到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杠杆和对人的智慧和能力的增强和延伸所起到重要作用。笔者一再说明，启蒙理性和科技理性本身是功莫大焉而没有罪过的。关键在于科

技理性和科技成果的占有方式和分配方式，关键在于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转化是否合理、适度和有益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好像并没有深谙后现代与后殖民的内在关联，对现当代西方文论，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魅力与局限缺乏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如对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多半只看到它的积极因素，而忽略了它的负面作用。后现代主义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具有代表性文化思潮，对我们弘扬文学的批判精神和解构精神，打破那些应当被打破的束缚，怀疑那些应当被怀疑的东西，颠覆那些应当被颠覆的观念、体制和机制，从而对促进思想解放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冷静的学者应当意识到，百年来受伤的中国历史老人拖着带着镣铐的步履，沉重而又蹒跚地刚刚步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尚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在一些已经趋于高度发展的城市和地区不断滋生着后现代主义的因素。但从全局上说，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还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存在着明显的时空错位。由于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历史反差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区别，我们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当代中国的国情和文情对选择和使用后现代主义话语体系和话语权力的制约作用，以便增强自觉性和有效性，克服盲目性和虚假性。从全局上说，后现代主义是非理性的，是不利于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比如，极端地倡导“非统一性”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的；极端地主张“碎片化”、“无深度”、“削平价值”、“中止判断”笼统地抵制“逻各斯”，反对启蒙理性，实际上无异于制造新的蒙昧主义和新的自由主义，是不利于“按客观规律办事”，实施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的；极端地反对科技理性是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命题相悖立的，是不利于科教兴国的。先进的尖端的科技成果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人类发射的卫星撞击了彗星，扫描并造访了火星。如果借用拟人化的手法，人们可以想象，火星和彗星一定会用诗的语言来赞美人类给它们带来的福音：彗星伸开热情的双臂狂喜地拥抱，啊！来自远方的朋友，我的爱神厄洛斯，我惬意地接受您的飞吻。火星睁开朦胧睡眼亲昵地问候，啊！来自地球

村的信使，我深情地接受您的顾盼，欢迎你们这些来自绿色星球的贵宾到这里实现“诗意地栖居”。当代中国的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已经处于国际前列，不仅改变了旧中国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而且壮了国威，扬了军威，使中华民族雄起，挺直了脊梁，抬起了自信而高傲的头颅。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感召下，科教兴国、科技兴厂、科学种田、科学管理，使当代中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而受到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影响的一些学者却只强调科技理性和科技成果对人的压抑的一面。这种声音是不协调的。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

辩证的唯物史观研究文学的基本要求是强调真实地反映生活。诚然，艺术的真实不能等同于生活的现实。艺术的真实是具有主观性、虚构性和假定性的。但同样要合情合理，同样要遵循生活发展的整体逻辑。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关系到艺术的源泉和发展道路。现实主义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仍然可能是文艺创作和文艺观念的主潮。我们应当弘扬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反对“瞒和骗的文艺”，反对文艺领域中肆无忌惮的造假运动。有些作品从整体到局部，从典型环境到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到典型细节都是不可信的，甚至找不到一点真实的影子，完全是主观随意虚构的。为了消费和摄取文化资本的需要和夺人眼球的狡黠的设局，完全把郑重严肃的东西玩耍化和游戏化，甚至像《康熙微服私访记》那样非常好看的优秀影视作品，都附带屡见不鲜的虚假的人物、故事和情节。据权威的史学家称，康熙皇帝没有进行过一次微服私访活动，据史书载，他自己还曾这样公开申明，因为老百姓都认识我，朕微服无用也，因寡人的信息很畅通，用不着去搞什么私访。一些专门写皇帝的影视作品，多半都把这些君主描绘成人世间的才俊和楷模：他们都具有侠骨柔肠，非但宅心仁厚，而且功夫了得，铮铮铁腕，脉脉温情；既是圣君，又是情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蒙冤落难女子于水深火热之中；最后两情相悦，宠为爱妃美妾。这种胡编乱造虽然是不真实的，却能起到以假乱真或以假当真的作用。特别是青年们看后，真的相信并以为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如

是也。这样虚假的情节设计显然是不尽合理的。艺术创作制造虚假，实际上对生活中的造假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弥漫于现实生活中的虚假、弄假和造假之风，歪曲真实的生活和生活的真实，污染着纯真而善良的人心，败坏社会的诚信和正义。这是具有良知的人文知识分子需要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

这里，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各种文艺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恢复、发展和弘扬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与之相关涉的文艺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文艺观念是多样的。归结起来，可概括出两大文脉：一脉是现实主义的；另一脉是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前者偏重于研究文学与时代、历史和社会的关系，主要体现历史精神；后者偏重于研究文学与人文的关系，主要体现人文精神。通过美学精神实现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正是艺术的至境。这两大文脉都是人类研究文学活动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和精神财富。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互存、互动、互释、互惠和双赢的间性关系。企图用现实主义取代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或谋求以表现主义和浪漫主义置换现实主义都是不应当的，也是办不到的。但是，我们所强调的是，即便是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幻想主义、审美乌托邦、诗学研究的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也应当原则上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的基本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科学精神和体现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文精神都是需要的，只要不是故意制造人文与历史的悖立，不企图夸大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对峙，都拥有自身存在和发展的空间。文艺思想和文艺观念中存在着一些重大分歧。从古至今，这两大文脉：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反映论和表现论、重思想的文艺理论和重情感的文艺理论、崇尚“真的艺术”和膜拜“美的艺术”、对文艺的诗学研究和对文艺的科学研究，如此等一些重大的美学和文艺学问题，都只有运用科学发展观和唯物的辩证方法和辩证的唯物思维方式才能得到比较正确的理解和阐释。笔者认为，深入系统地研究上述文艺理论两大文脉的彼此互动的间性关系仍然是当代中国学者和世界学者的学术使命。

问题的关键和症结在于，有些学者不再承认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的合理性，总是着意通过对文艺的特殊性、独立性、自律性的不适度的强调，贬抑和诋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表现出“去科学化”、“去现实主义化”的精神意向。这是不妥当的。对文艺的浪漫主义研究、对文艺的表现主义研究、对文艺的重视人文情感的审美研究，同样以自身的特殊方式和手段，应当有益于激发人们对真理的追求，有利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历史的科学发展，有助于实际地改变人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不要把人们的现实要求引向远离实践和导入不能且无法实现的抽象迷茫的虚假的幻想和梦境之中。历史唯物主义主张把一切精神现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历史条件下、历史结构里和历史过程中加以分析，以推动历史的科学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权威性的标准，因而更加重视实践的力量和改变现实环境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把具体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人的解放理解为一种改变社会现实，同时在改变社会现实的创造性活动中改变自身和完善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① 他们指出：“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原理”是“否认纯理论领域内的解放，认为这是幻想。”^② “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③ 历史唯物主义努力把人们引向真实的现实生活，即引向实践，不主张把人们引向不切实际的虚假的情感世界，即引向审美乌托邦。虽然人们为了生活不能没有幻想，但幻想并不能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和人们的实际面貌会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而只有靠变革现实的富于创造性的改革实践，才能真正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促进人的生态的改善。人们不应当在幻想中讨生活。因此，对被发展了的幻想主义、浪漫主义、审美乌托邦的思想传统，至少不应当强调以非科学的人文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第74页，人民出版社，19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2卷，第121页，人民出版社，1995。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2版），第1卷，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95。